

何超瓊：京港合作促「老有所養」



在銀川市長城花園社區的老年人日間照料中心，幾位老年人在排練歌舞節目。

本報北京傳真

據北京市民政局數據顯示，2013年市內戶籍老人達277萬，佔戶籍人口21%，老年人口正以每天400人、每年15萬人的規模和年均6%的速度增長。人口增長快並日益呈現高齡化、空巢化趨勢。對此，北京市政協常委、信德集團董事總經理何超瓊在今年北京市兩會遞交提案，呼籲建立居家養老支持體系，通過延長退休年齡、強化個人及地方養老基金經濟實力等措施，並可擴大京港在此領域合作，促使「銀髮社會」人民「老有所依」、「老有所養」。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王頌



何超瓊在2015年北京市兩會。

記者何凡攝

評級，以有效分配政府資源，推進產業發展。「其他政策和周邊軟性配套亦不可或缺，如教育宣傳居家養老，長遠的退休保險及醫療保險等。」

借鑒香港經驗加強人才輸入

何超瓊提出，北京應積極放寬培訓護理員，以應對需求。去年北京與香港落實《北京市衛計委與香港醫院管理局2014至2019年度合作備忘錄》，可向香港借鑒有關培訓服務經驗；長遠可擴大區域合作範圍，如人才輸入等。政府也可投放培訓資源於醫學院，讓專業醫療人員及從業員培訓老人護理員，將專業知識及經驗與受訓人員分享，培訓質素亦有保證。

何超瓊指出，老人的生活品質很大程度上繫於退休人士的經濟能力。內地相比其他發達國家起步較慢，民眾未富先老；內地多年未有對法定退休年齡作調整，退休年齡不合時宜，且養老基金投資範圍過於狹窄；從政府角度說，基金部門在管理基金上存有衝突，企業年金、個人保險等主要是用來填補強制性的養老基金的替代率，以致常要動用中央財政儲備來補貼百姓的養老金。

轉變管理模式 穩固養老基金

她在提案中建言，養老保險基金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應分開管理，採用不同的基金管理模式，即統籌賬戶交由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運作；個人賬戶則由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委託給合資的私營基金管理公司運作。另一方面，可加大力度推動企業年金，為養老基金建立另一穩固支柱。

中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2億。作為世界上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過億的唯一國家，中國重慶老齡化和高齡化問題將越來越突出。老齡化對養老、醫療衛生服務等相關領域不斷帶來新挑戰，加強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任務繁重。

建議對老年人進行全面評估

在何超瓊看來，目前北京養老機構發展主要存在四方面問題：一是設施不足，未契合長者人口分佈。二是行業內缺乏資源人手，且現時從業人員普遍教育水平不高，大都未具有醫療知識。三是社會辦及政府辦設施互相競爭，難以生存。四是現時大部分小區養老機構未登記，未符合標準，現時營運的養老服務設施中，僅兩成符合城市規劃、建設用地、消防安全等條件。

對此，何超瓊建議政府對全市老年人進行周期全面性評估，以此為依據提供合適服務；鼓勵民資加入「銀髮產業」，可提供低息借貸，以加強競爭力推進產業發展。同時建立評分檢討制度，為服務提供商

李稻葵：亞投行需充分創新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馬玉潔、何凡）近日，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見圖）在京指出，亞投行的決策應以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而不應過多考慮政治因素，要使其真正服務於世界各國的普通大眾而非某些國家的統治階層。他認為，對於現有的國際治理和國際組織的文化的變革，亞投行需要進行充分創新。他又指出，在當前內地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過程中，應努力做好兩件事，即盡快發行地方債和設計正面激勵機制促進地方政府有所作為。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論壇近日在京舉行。李稻葵在此間表示，亞投行的使命，應清晰定為一個為亞洲地區大眾謀求長期經濟發展的非營利組織。其服務目標是周邊國家長期的經濟發展，而非相關國家的短期利益。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馬玉潔、何凡）近日，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見圖）在京指出，亞投行的決策應以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而不應過多考慮政治因素，要使其真正服務於世界各國的普通大眾而非某些國家的統治階層。他認為，對於現有的國際治理和國際組織的文化的變革，亞投行需要進行充分創新。他又指出，在當前內地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過程中，應努力做好兩件事，即盡快發行地方債和設計正面激勵機制促進地方政府有所作為。

亞投行可成立三新型委員會

他強調，亞投行在銀行治理方面須有創新。在效仿現有國際機構的基礎上，可成立至少三個新型委員會：由各國根據投票權投資量來分配的董事會，每個國家都有一個席位的監事會，及包括相關地區的工會代表、勞動組織代表、學術代表和資本市場代表甚至文化保護方面代表的議事會；從而使得重大事宜決策在事先得到充分商量，力求聽到不同的聲音。此外，亞投行也應強調文化建設，強調公開的、高效的、包容的文化，吸引全世界的精英前來工作，並保證亞投行的決策符合相關地區大多數民眾的利益。

對於內地經濟形勢，李稻葵表示，增速下行的底部已開始浮現，對經濟長期增長應有充足信心。同時他認為，穩經濟比穩增長的含義更廣、更重要。穩增長只關係到GDP增速，而穩經濟要求整體發展勢頭基本穩定，且逐步上行。

鑄設激勵機制促地方政府有為

他並提出，從中央的角度，應設計一些正面激勵機制促進地方政府有所作為。具體形式可包括通過由上級政府對直接下級設立優異表現獎，來彌補GDP增速放緩帶來的激勵空缺。而考核標準可以在改革、創新和環保等方面的工作業績，來彌補GDP導向結束後正向激勵缺失的情況。「中國經濟過去三十多年的基本經驗，是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要與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往一處使勁。這個重要經驗不能丟。」李稻葵說。

趙啟正：新媒體時代公共外交需全民參與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記者馬玉潔）國內首部公共外交藍皮書——《中國公共外交發展報告（2015）》近日在京發佈。藍皮書主編，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外事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公共外交研究院院長趙啟正（見圖）表示，新媒體時代中國的公共外交工作，要更多依靠政府之外的力量，最大可能地調動和發揮普通民眾參與。

出境遊客是公共外交自動承擔者

趙啟正表示，凡是有能力和外國人交流的人，都有承擔公共外交的責任。他以赴海外遊客為例說，中國每年有1億人次出境旅遊，除了港澳台至少四分之一是到外國，「不論在巴黎鐵塔下，在涅瓦河畔，還是在大都會博物館都能聽見中國的聲音。」他們是公共外交的「自動承擔者」。

他指出，他們之中很多人並無公共外交的概念，其言行表現卻有公共外交的效果，即會提升或損害中國的形象。「比如出國不排隊，吃了飯剩一桌，在人家的古建筑刻個字，做的就是負面的公共外交。」他強調，提倡公共外交實際上是提倡中國文化的進步、公民意識的增加。

企業「走出去」應有對話本領

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將走出國門。在趙啟正看來，公共外交對企業來說是「走出去」的必修課程。

他表示，企業「走出去」面對的不僅僅是國外企業，更是面對整個國際社會，包括與政府、議會、工會、媒體、環保組織等各方的溝通。對此藍皮書也指出，中國跨國企業在輿論引導力、公益活動參與度上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趙啟正坦言，目前民間承擔的公共外交還比較弱，而企業從其切身利益出發，有機會成為民間公共外交的重要突破口。

歷史地看待「十二年過渡期」的「民主選舉」

專家看香港政改（三）



齊鵬飛

有一個情況須特別說明，在英國人統治香港的最後一段時間（即自「舊香港」至「新香港」的「十二年過渡時期」）裡，香港立法局的地位和功能、香港立法局議員的產生和議院結構，的確發生了重大改變，開始引入了所謂「代議制」的因素、開始引入了民主選舉的成分。

- 如1985年立法局的部分議員開始實行間接選舉；
- 如1991年立法局的部分議員開始實行直接選舉；
- 如1995年舊香港的最後一屆立法局的60名議員，全部由選舉產生——地區直接選舉20席、功能組別間接選舉30席、選舉委員會間接選舉10席。立法局的主席也不再由香港總督擔任，而是由議員互選產生。

那麼，為何立法局在這時候會產生如此重大的變化？我們必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那就是經過中英談判，英國人非常明確地意識到他們在香港的殖民統治已無法再繼續下去了，在1997年7月1日他們必須把香港交還給中國。因此英國人為能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後繼續保持他們對香港的影響力甚至是控制力，他們才決定在香港的「過渡時期」突擊搞有利於他們的政治安排，以便在他們「光榮撤退」以後，在香港還有可以代表他們利益和意志的「政治代理人」，香港回歸以後還可以是一個「沒有英國人的英國社會」。

他們搞這種政治安排的突破口，就選在立法局——因為他們知道香港未來的「總督」——即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他們不好控制，因為對於行政長官，中國的中央政府掌握有實質任命權；但是香港未來的立法局——即香港特區的立法會，他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控制——因為立法會選舉出來，僅僅需要報中國的中央政府備案而不是批准，所以，如果這個選舉制度設計好了，至少可以保證他們中意的「政治代理人」可以在其中佔據很大一部分——至少是關鍵少數。

因此，在「過渡時期」，英國人通過1984年《代議政制綠皮書》、1985年的《代議政制白皮書》和《立法局（權力及特權）條例》、1992年彭定康的「政制改革方案」，逐步實施和完成了這一戰略佈局。這也就是為什麼英國人在香港一百多年的殖民統治期間都不搞「民主」，而偏偏在「光榮撤退」前的十幾年間在香港突擊搞「民主」的真實原因。也就是說，英國人在「過渡時期」在香港突擊搞的「民主」，其出發點並不是他們所標榜的「還政於港」、「還政於民」，而是為了最大化地保證英國人在1997年香港回歸以後的利益以及影響力甚至是控制力。

因此，我們歷史地看，香港的民主絕不是英國人在「英人治港」的殖民統治時代「恩賜」給香港人民的，在那個時代香港人民是沒有任何政治參與權力、沒有任何民主選舉權力的。在那個時代，有兩句很流行的話可以非常形象和生動地說明這個問題——一句是「香港有自由無民主」；一句是「香港人有政治冷感」。這是英國人在「英人治港」的殖民統治時代給港人留下的非常「尷尬」的歷史遺產。

（作者係北京市政協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主任）